



文史哲博士文丛

明代通俗类书研究

◎ 刘天振 著

齊魯書社

PDG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 刘天振 著

明代通俗 类书研究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明代通俗类书研究 / 刘天振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12

ISBN 7 - 5333 - 1760 - 2

I. 明... II. 刘... III. 百科全书—研究—中国—明代 IV. Z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7603 号

明代通俗类书研究

刘天振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qlss.com.cn>

E-mail: qlss@sdpress.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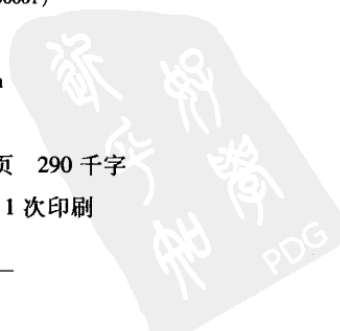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2 插页 290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33 - 1760 - 2

K · 553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编 总论	10
第一节 类书与通俗类书	10
第二节 歌诗与通俗类书	20
第三节 赋体与通俗类书	32
第四节 传统类书编排体例之演变	39
第五节 宋元时期通俗类书兴起的历史背景	46
第六节 宋元时期通俗类书研究	55
第七节 明代通俗类书繁荣之原因	77
第二编 明代日用类书研究	110
第一节 明代日用类书编刊之概况	110
第二节 文契体式与晚明世相	113
第三节 词状文书与民间立场	129
第四节 书启活套与世态人情	144
第五节 风月与性爱	159
第六节 市民与诗情	166

第七节	笑谈与谑世·····	172
第八节	明代日用类书体例上的创新·····	175
第九节	明代日用类书的价值·····	177
第三编	道德故事类书研究 ·····	185
第一节	道德故事类书之性质·····	185
第二节	《日记故事》的典范性·····	191
第三节	《书言故事》等书的教化方式·····	202
第四节	劝惩与道德拯救·····	212
第五节	题旨单一的故事类书·····	217
第六节	孝道与劝善故事的反讽意味·····	224
第七节	女教故事的反讽·····	230
第八节	明代通俗故事类书体例之创新·····	248
第九节	通俗故事类书的价值·····	256
第四编	娱乐性通俗类书研究 ·····	260
第一节	娱乐性通俗类书的性质·····	260
第二节	四种娱乐性通俗类书的版本研究·····	268
第三节	娱乐性通俗类书体例溯源·····	304
第四节	文学总集的编排体例·····	322
第五节	明代娱乐性类书的编纂体例·····	326
第六节	娱乐性通俗类书的内容·····	337
第七节	娱乐性通俗类书的思想内涵·····	341
第八节	明代娱乐性通俗类书体例及题材的演变·····	348
第九节	中篇传奇的文化品格·····	350
第十节	中篇传奇小说叙述方式溯源·····	362

第十一节	“诗文小说”与“体兼说部”的诗话、词话	371
第五编	通俗类书与古代小说研究	382
第一节	通俗类书与明清小说研究	382
第二节	类书与文言小说总集的编纂	389
参考文献	399
后记	408

引 言

类书是中国古代一种非常巨大的文献宝库，仅以清代中叶编纂的《四库全书》为例，类书的篇幅占据了《四库》的百分之十，在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1500册中，类书竟有150册，《四库》中卷帙最为浩繁的书如《册府元龟》、《佩文韵府》等，都是类书。但是一千多年来，人们对于类书的定义、性质、范围等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认识，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类家”小序云：“前史有杂家，无类书。近代纂述丛杂，乃为别出。要之，杂家出自一人，类书兼总诸籍，自不容涵也。”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的小序云：“类事之书，兼收四部，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可归类。”胡应麟甚至提议将类书逐出传统的四大部之外：“类书《郑志》另录，《通考》仍列子家，盖不欲四部之外别立门户也。然类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御览》、《元龟》事实咸备则邻于史，《通典》、《通志》、声韵、礼仪之属又一二间涉于经，专以属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别录二藏及贗古书及类书为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① 今人的看法也存在一些差异，张

^①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287页。

涤华认为：“凡荟萃成言，衰次故实，兼收众籍，不主一家，而区以部类，条分件系，利寻检、资采掇，以待应时取给者，皆是也。”^① 胡道静先生以为：“我国古代类书是‘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综合体。另外还要加上一条，就是他们的形式是区分门类的。‘类书’的名称本是由此得来。”^② 日本汉学家长泽规矩也认为：“所谓‘类书’，是指将原文加以分类另行编排的书籍。”^③ 尽管上述诸家言人人殊，但是类书具有一定的形式、内容的规范，也是不容否定的。正如刘叶秋先生所说：“我们一方面应该把类书的界限划清，排除那些混在里面的其它杂著，另一方面也须综合内容、体例和编撰目的这三点来辨别类书与貌似的著作，以免片面地看问题，把真正的类书误归他类。”^④ 综合各家观点，我们至少可以概括出类书的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汇编资料，述而不作。不是著述，而是对前人成说进行编纂；二是以分门别类形式编辑成书；三是，编辑目的是供人寻检采掇。

“通俗类书”当然是相对于“类书”而言的。“通俗类书”之名原出上世纪30年代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一书，在此书中，孙氏将“通俗类书”单独划出一类，所列篇目有《京台新楔公余胜览国色天香十卷》、《新刻云窗汇爽万锦情林六卷》、《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十卷》、《增补批点图象燕居笔记》等四书，这几种书的刊刻年代都在明万历至

① 张涤华：《类书流别》，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页。

②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页。

③ 长泽规矩也：《〈和刻本类书集成〉序》，见《和刻本类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④ 刘叶秋：《类书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明末这一段时间。其实，孙氏所称的上述几书仅仅是明清通俗类书中的一种，其主要功能是供人娱乐消遣。孙氏的界定和称谓对后来学界影响很大，此后不少人提及“通俗类书”，往往也指上述书籍^①，如日本学者大塚秀高《明代后期文言小说刊行概况》^②一文中所说的“通俗类书”，就是沿袭孙楷第的定义。其实明代“通俗类书”的范围远远不止上述一类。

从当代学界使用这一称谓时的指称对象来看，范围并不固定，但一般超出孙先生所定义的范围。如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明代的传奇文和通俗类书》，其“通俗类书”名目下所列书籍除了孙楷第所说《国色天香》等四书之外，还有《朱翼》、《日记故事》、《书言故事》等书，而后三书的性质显然有别于《国色天香》。^③张志公先生《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中用“通俗类书”之名称呼《事林广记》、《万宝全书》等百科全书式的实用类书^④，也与孙楷第所指相差甚远。著名类书研究家胡道静先生在介绍元至顺刊本《事林广记》时又曾用“民间类书”^⑤称呼《事林广记》、《万宝全书》，他是从编刊主体角度而言的，其内涵实际同于张志公的说法。

①〔日〕酒井忠夫认为，通俗类书是“小说话题之类书集成”，“通俗类书型之书可以崛起于小说之中”（酒井忠夫：《明末新文化与读书人层》，收录于《立正大学史学创立五十周年宗教社会史研究》，雄山阁1997年版），但是酒井氏并未作出明确定义。

② 载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文化》1981年第三期。

③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0~412页。

④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第110页。

⑤ 胡道静：《元至顺刊本〈事林广记〉解题》，载《百科知识》1979年第5期。

根据题材属性，并综合学界各家观点，我们以为，通俗类书是相对于官修大型类书及文士私撰类书而言的、主要由民间书坊编刊的一类书籍。之所以冠以“通俗”的定语，也是有别于官修、私撰类书庄严典重的文化品格而言的，是指它的题材和形式都体现出鲜明的通俗文化品格。

相对于正宗类书的研究，我国学术界对于通俗类书的研究是十分薄弱的，可以说，截至目前国内并无专门系统的研究。

对于中国古代类书内容演变的规律，张涤华先生认为，千余年来类书内容有三变：

最古类书，大都专辑故事（如《皇览》、《遍略》）；稍后乃有据拾字句者（如《语对》、《语丽》）；更后则事文兼采（如《类聚》、《初学记》）。故类事之书，其始多混入史、子，而后来又往往与总集参合。^①

张先生这段话对于宋代以前类书内容演变史的概括可谓精练，但它并不能适应宋以后类书发展的实际，因为宋代以后民间编刊的大量通俗类书的内容题材，远非上述三种类型可以囊括一空。

郑振铎、胡士莹、孙楷第、王重民等前辈学者曾经从文献学角度，对通俗类书做过一些著录、介绍的工作，他们呼吁重视对这些民间通俗读物的研究，郑振铎先生曾说：“斯类通俗流行之作，为民间日用的兔园册子，随生随灭，最不易保存……研讨社会生活史者，将或有取于斯。”^② 王重民先生对于

① 张涤华：《类书流别》，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21 页。

② 郑振铎：《西谛书目题跋》，文物出版社 1963 年 10 月第一版，第 10~11 页。

明代百科全书式日用类书和娱乐性通俗类书均极重视，他对明刻《订补全书备考三十四卷》所作的提要中说：“盖是书所载，于近八百年来，民生日用，文学哲学，礼俗游艺，以及医卜星象等事，凡所以维系世道人心者，莫不有之，讲社会学史者，欲真知下级社会人生，不可不读是书也。”^①他对学界忽略《绣谷春容》等娱乐性闲书的现象颇为不满：“余以是书所载，无人注意，同一传奇也，洪楸所刻《清平山堂话本》则珍之；同一故事也，宋季所刻《醉翁谈录》则珍之，若考其源流，余诚愿世人能推及此也，故详论之。”^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遗愿并未实现。

从类书研究现状来看，一般都是重正宗类书而轻通俗类书的。张涤华先生上世纪40年代用文言著成的《类书流别》（通行本有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一书，对古代类书探其源而穷其流，但考论范围只及官修大型类书；夏南强《类书通论》^③一书是新世纪出版的一本全面论述古代类书的专著，但其重点也是官修大型类书和私人撰写的著名类书，其第五章、第六章“类书的发展与演变”（上、下）对于宋代以后的实用性类书有所涉及，但是并未进行深入探讨。其“‘事文并举’与‘经世致用’”一节所研究的“经世致用”类书是指的隋代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唐代杜佑的《通典》、张鷟的《龙筋凤髓判》，以及韩偓的《岁华纪丽》。上述诸书，除了杜佑《通典》属于典章制度类书，有“经世致用”之目的外，其他

①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类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页。

②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00页。

③ 夏南强：《类书通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几部，如张鹭《龙筋凤髓判》属于应考类书，另外三种都是专为文人作文而编的，这还都是传统类书的常规用途。他所说的“帝王之学的回归”，是指类书发展从三国时专供皇帝御览的《皇览》，又回归到宋代专门服务于皇帝的《册府元龟》。其实，这种现象能否算作一种“回归”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官修类书的“帝王之学”色彩是其一贯的传统。此书对于民间编刊的通俗类书有所触及，在第七、第八章《类书的发展与演变》的第五节《从“格物”到“日用”》中涉及了宋明的日用类书，但止于笼统介绍，并未进行具体探讨。只有胡道静先生真正重视了民间类书这一笔历史文献，他在《中国古代的类书》第二章有一节专论“类书的范围和各种类型”，从内容性质、编录体裁、编录方法、编纂情况、提供的用途等五个角度详细论述了“正宗类书的类型”，在“按编纂的情况”讨论时，他分为三种情况：官修的、文人学者自己编的和书坊编辑的。第三种情况他列举了《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事林广记》；在“从编纂当时提供的用途”论述时，他归结为五种用途：有为一般检查的，有为诗文取材的，有资料场之用的，有供启蒙之用的，有备家常日用的。第五种用途的类书，他列举了明代的《万用正宗不求人》、《文林聚宝万卷星罗》，并指出，最后一种类似现代的“日用手册”或“日用百科全书”。^① 胡先生的研究特别注意到了宋元及晚明民间书坊编印的“日用手册”式的通俗类书。他对现存最早的大型民间类书《事林广记》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他的《元至顺

^①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11页。

刊本〈事林广记〉解题》^①一文，对于这部在宋元明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民间类书的诸多问题，如编者情况、版本演变及存世情况、此书体例的创新、学术价值等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探讨，他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最早对这些文献重视并开始研究的是 50 年代以来的日本学界。如日本社会经济史学者酒井忠夫，最早使用晚明时期的日用类书研究中国古代的平民教育、经商路线和商业实践等等问题。最近几年，日本一些学者，如小川阳一开始利用日用类书中的资料研究明清通俗小说，把两者中所展示的社会生活进行对比研究，从中发现了许多共通之处，以前明清小说研究界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这些类书中找到了答案。如《金瓶梅》中关于占卜、酒令及宗教活动的描写，都可以在《不求人》、《万宝全书》之类的日用类书中找到根源，从而为明清小说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

最近几年，中国的一些社会经济史学者也开始重视晚明日用类书的价值，如陈学文、李伯重等利用这些文献研究明清经济史、出版史等，其论著如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的商品流通与水运业的发展——从日用类书中商业书有关记载来研究明清江南的商品经济》^②、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③等。但是，对于明代通俗道德教育类书、娱乐性通俗类书的研究，国内学界基本上还是空白。

① 胡道静：《元至顺刊本〈事林广记〉解题》，载《百科知识》1979年第5期。

② 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的商品流通与水运业的发展——从日用类书中商业书有关记载来研究明清江南的商品经济》，载《浙江学刊》1995年第1期。

③ 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之所以轻视甚至忽略通俗类书，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学术观念的保守，以为这些流播民间的通俗读物没有什么学术价值，难以登上学术研究的殿堂；二是由于这些资料多数藏于海外，目前所知，这些书籍绝大多数藏于日本，使国内学界难以有机会接触，这是一个制约研究的客观原因。

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转变传统学术观念，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正如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小说所经历的学术命运一样。^①同时，我们要增强历史责任感，着手整理这一笔历史文献，为开展学术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

通过探讨明代日用类书与当时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我们揭开晚明时期理想的日常生活的面貌，以及这些读物又是怎样影响了当时的日常生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明代通俗类书在当时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

我们还可以将晚明时期的通俗类书与宋元时期的同类书籍如《事林广记》、《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进行比较，来观察从十三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变化的规律是什么。

通俗类书是当代通俗文化的忠实记录，开展这项研究，还可以为其他通俗文化现象，如通俗小说、市民娱乐文化的研究开拓新的视角。譬如，明清小说与通俗类书，无论是文化属

^①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小说观念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正统观念一直把写作、阅读小说视为“玩物丧志”的表现，学术界很少有人严肃对待小说。只是到了西方小说观念传入我国，梁启超等人鼓吹“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才被视为“文学之最上乘”，然后，小说研究才日渐走上兴旺发达之路，并成为二十世纪文学研究中的大国。

性，还是反映的生活文化面都有共通性。长期以来，明清小说研究界习惯于从精英文化角度，如程朱理学或王阳明心学角度，对小说作品进行观照和阐释，得出的结论有时看似有理但又有些牵强。而从通俗类书这样的民间文化视角去研究、解读，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更贴近作品内容、思想、艺术方面的实际。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些读物探讨当时的文化观念、审美风尚、社会风俗、社会心理等。

第一编 总 论

第一节 类书与通俗类书

以下我们通过和官修、私撰类书的对比，来进一步透视通俗类书的性质、范围。

从编纂主体来说，类书可分为官修的、文人学士私撰的和书坊编刊的三类。其中，第一种一般由皇帝亲自组织朝臣通儒编写而成，在文献资源、编者待遇等方面都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胡应麟总结类书编纂历史经验时说：“今传大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皆千卷，可谓富矣，然贞观中编《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金轮朝编《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简帙皆多于宋。又许敬宗编《瑶山玉彩》五百卷，张太素编《册府》五百八十二卷，视今传《合璧事类》等书亦皆过之。……然诸书惟孝标一二出自独创，自余皆聚集一时之文士奉诏编纂者，非一人手裁也。”^① 胡应麟总结了类书编纂史上一个显见的规律，即著名类书“皆聚集一时之文士奉诏编

^①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页。

纂者，非一人手裁”的事实。

私撰类书者，一般都是名士硕儒或王公显宦，他们一般经济基础雄厚，藏书资源丰富，个人学养深厚。如虞世南撰《北堂书钞》时为隋朝大业年间的秘书郎，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州本卷十四）中说：“《北堂书钞》，唐虞世南仕隋为秘书郎时钞经史百家之事以备用。北堂者，省之后堂，世南钞书之所也。”编撰《龙筋凤髓判》的张鹭，登进士第，累官至四门员外郎。同样，白居易编《白氏经史事类》（即《六帖》）不仅得益于优越的官位和学养、雄厚的藏书，还有众多学生的帮助以及科学的编纂方法。宋黄鉴《杨文公谈苑》（宛委山堂本《说郛》引）记载：“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抄录成书。故其记时代，多无次序。”因而所谓私撰类书，并非一般穷困潦倒的文人能够完成。正如明沈际飞《古今类书纂要序》所言：“昔者为是举者，非朝臣开局为之，则身居秘阁、家有赐书。”而通俗类书一般是书贾亲自操觚编修，或下层文士与书坊合编，有时不署名氏，因而其书编者往往难以确考。

从兴起时间来看，官修类书的编纂至少可追溯到三国时的《皇览》，南北朝时续有编刊，唐代时已经蔚为大国了。私人撰著类书也不迟于隋代虞世南的《北堂书钞》。从时间上看，二者均早于通俗类书。通俗类书兴起的时间较晚，如胡道静先生所说：“要到刻板盛行、书肆林立的南宋时代才开始有的。”^①比前两种类书的产生分别晚了大约一个世纪和半个世

^①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页。